

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图景与发展趋势

——基于近十年CSSCI来源期刊论文的实证分析

朱东阳, 王攀峰*, 孙彬涵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基于DiVoMiner数据挖掘平台,对5种教育学CSSCI来源期刊2013—2022年间刊载的859篇论文进行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揭示了近十年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状特征、发展动因和演变趋势。研究发现,近十年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多元格局得以深化,定量研究持续增长,混合研究成为第三大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运用更加多样,研究者建构本土理论的方法论自觉有所增强;科学共同体和教育学交叉学科是推进范式转型的关键。对此,应进一步探索新型科研评价方式,深化实证研究进程;促进大数据与教育研究深度融合,引领实证研究发展方向;扎根本土教育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体系。

关键词:教育研究;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文献计量法

中图分类号:G40-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333(2024)07-0007-07

一、引言

研究范式是学科建设的核心议题。它是科学共同体在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某一领域研究问题的共同信念,影响着研究者对研究问题、路径与方法的选择,也制约研究者对研究结论的解释和使用倾向。换言之,研究范式是研究方法的上位概念,一类范式下并存多个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倾向支配着研究者对具体方法的选择与使用。当前,我国教育学的学术体系建设和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学科影响力仍有待提升^[1]。在此背景下,关注范式研究、推进范式转型是提升教育决策科学化水平,增强学科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

21世纪以来,随着研究者对教育研究范式重视程度的加深,以教育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为主题的文章层见叠出。现有研究围绕教育研究范式的基本概念、价值阐释、历史演变、现状特征、创新发展等议题进行论述。许多学者对其进行现状剖析,刘晶波、高耀明、钟秉林、张慧、胡来林、刘丽敏等学者分别就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职业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外国教育史的范式状况进行描述性统计^[2-7]。部分学者就中外教育研究期刊中的范式特征进行国际比较,发现思辨研究是国内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范式,而实证研究在国外同类期刊论文中较为普遍^[8-9],我国教育实证研究与国际教育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普及程度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王树涛、韩双淼、严凌燕等学者的文献计量结果^[10-12]亦支持上述结论——量化和质性研究是当前国际教

育领域最为常见的两类范式。然而,上述研究多集中于教育学二级学科内部,针对我国教育学一级学科范式特征的成果十分匮乏。郑日昌等较早采用随机抽样对1981—1998年间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定性研究占据重要地位(该研究将所有非定量研究均纳入定性范畴),定量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教育研究正逐步打破范式单一的局面^[13]。姚计海等以5种教育学综合期刊在2001—2011年刊载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对其呈现的范式特征及发展情况进行现状描述,提出思辨研究是我国教育研究的主要取径,定量研究呈逐年上升趋势,质性研究和混合研究的占比很小^[14]。

综观既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教育学二级学科内部,对于我国教育学一级学科整体的范式特征把握不足;研究时有限有待更新,研究成果多集中于2020年以前,历时十年及以上的追踪研究尤显匮乏,对近十年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状剖析寥寥无几;研究内容较为单一,大多是对范式特征的客观描述,缺乏对其影响因素和发展历程的深入探讨。鉴于此,本研究力图在研究视角、研究时限和研究内容上有所突破,通过对国内5种高水平教育学期刊近十年研究成果的统计分析,呈现我国教育学一级学科研究范式的整体特征,揭示其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进而提出推进教育研究范式创新发展的可行进路。

二、研究设计

在数据来源方面,本研究以2021—2022年度中国社科

学引文(CSSCI)收录的教育学来源期刊(37种)为参考范围,综合考虑期刊定位及影响因子,选取《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教育科学》、《电化教育研究》为目标期刊。上述5种期刊除特殊教育、学前教育学和成人教育学较少涉及外,涵盖了教育学所涉全部二级学科,能全面展现本学科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代表学科发展的最新动向。研究者按照10%的比例对上述期刊2013—2022年刊载的全部8590篇文献进行随机抽样,得到859篇分析样本。^①借助在线数据挖掘与分析平台DiVoMiner完成编码、统计与可视化分析,并运用SPSS 26.0进行频次分析和卡方检验。

本研究从“研究范式”和“发展动因”两个维度分别编码。借鉴国内外学者对教育研究范式分类的观点(黄忠敬等,2020;余胜泉等,2019;王卫华,2019;姚计海,2017;Khaldi,2017;Creswell等,2014;Morgan,2007;Johnson等,2004)^[15-22],以思辨、定量、质性和混合研究为一级指标,以教育学代表性的研究方法为二级指标构建教育研究范式编码体系(见表1)。

在“发展动因”方面,科学共同体是拥有范式选择权并推动新旧范式转换的关键力量^[23]。科学共同体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拥有共同范式和研究基础的学者群体;二是成熟的理论阵地和平台^[24]。同时,库恩强调“科学发现”对于范式转换的价值,提出“科学发现的突显”通过挑战原有知识体系的核心部分而为范式转换铺设道路,社会科学中此类“突显”可引申为新的研究问题及其衍生的研究领域。由此,确定影响范式发展的三类动因:研究主体^②、研究阵地^③和研究领域^④。

三、研究发现

(一)整体状况:思辨研究仍为主导、定量研究持续增长、混合研究方兴未艾

2013—2022年间,样本期刊文献呈现出以思辨研究为主导、定量研究次之、质性研究和混合研究各占有一席之地的范式格局。如图1所示,583篇论文呈现思辨研究特征,占发文量

表1 教育研究范式编码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思辨研究		理论思辨
		文献研究
		比较研究
		经验总结
		系统综述
		调查研究
实证研究	定量研究	内容分析
		实验法
		文献计量
		话语分析
		二次分析
		聚类分析
	质性研究	个案研究
		行动研究
		叙事研究
		田野调查
		话语分析
		扎根理论
		文本分析
		现象学研究
	混合研究	以定量为主导
		以定性为主导
		完全混合研究

的67.9%,可见思辨研究是样本期刊论文最主要的研究范式;168篇论文呈现定量研究特征,占发文量的19.6%,定量研究样本期刊论文的第二大研究范式;另有60篇文献(7.0%)呈混合研究特征,48篇文献(5.6%)表现出质性研究的特征。

鉴于方法学在五年内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25],且以五年为单位进行纵向比较是较为常见的做法^[10],本研究据此对范式的发展趋势进行推断。比较两组不同时期(2013—2017年与2018—2022年)的范式分布可知,思辨研究在波动中逐渐下降,由前五年的70.5%降至近五年的65.3%,降低了5.2%;质性研究基本保持稳定,近五年出现小幅下降;定量研究持续增长,由前五年的17.6%增至近五年的21.5%,提高了3.9%;混合研究亦呈现增长态势,尤其在2020—2022年间增长较快,超

① 抽样结果如下:《教育研究》219篇、《教育科学》90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90篇、《课程·教材·教法》270篇、《电化教育研究》190篇。

② 研究主体下设作者年龄、作者学科背景两个二级指标。编码时,将第一作者出生年份纳入统计,将其划分为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5个区间;学科背景以1997版《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教育学11个二级学科为主要依据。

③ 研究阵地划分为“直属师范”“地方师范”“九校联盟”“地方综合”“境外院校”“教育研究机构”“教育行政机构”7类。

④ 研究领域划分为纯教育学科和教育学交叉学科。纯教育学科是由教育学自身分化、拓展而形成的学科,样本期刊中涉及的9类纯教育学科为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师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农村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学;教育学交叉学科是以教育学立场与其他学科立场对话交流为基础,通过方法、理论等层面的交叉而形成的学科,样本期刊中涉及的6类教育学交叉学科为教育社会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技术、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心理学、教育政策与法律(参见侯怀银,原左晔:《教育学交叉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大学教育科学》2021年第5期)。

越质性研究而跃升为教育学第三大研究范式。整体而言,近十年间我国教育领域思辨研究仍为主导,质性研究发展缓慢,定量研究持续增长,混合研究方兴未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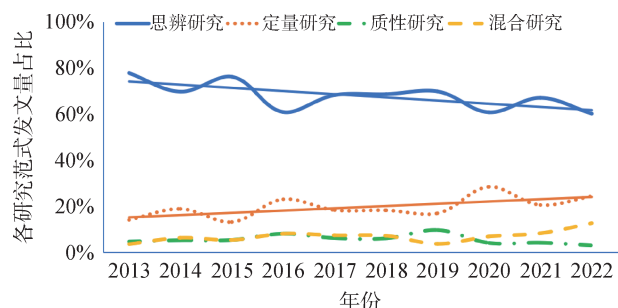


图1 2013—2022年间我国5种教育学期刊中研究范式的发展趋势

(二)具体状况:研究方法类型得以拓展、运用发生变化

1. 思辨研究范式中比较研究法的运用显著下降

统计表明,理论思辨是思辨研究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样本期刊中应用理论思辨法的论文多达360篇,占思辨研究总量的61.7%;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也相对常见,占比分别为12.0%和11.3%;经验总结法与系统综述法运用较少,占比分别为6.9%、8.1%。从发展趋势看,近五年文献研究法、系统综述法和理论思辨法的运用有所提高,分别增长了4.2%、3.0%和2.6%;而比较研究法的运用显著下降,降低了8.2%。经卡方检验,两组不同时期的思辨研究方法存在显著差异($\chi^2=13.053, p<0.05$),尤以比较研究法的下降最为显著(见表2)。

表2 思辨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及其发展趋势

研究方法	论文篇数(占比)		变化情况
	2013—2017年	2018—2022年	
理论思辨	182 (60.5%)	178 (63.1%)	2.6%
文献研究	30 (10.0%)	40 (14.2%)	4.2%
比较研究	46 (15.3%)	20 (7.1%)	-8.2%
经验总结	23 (7.6%)	17 (6.0%)	-1.6%
系统综述	20 (6.6%)	27 (9.6%)	3.0%

2. 定量研究范式中二次分析法得到更广泛应用

定量研究中最常运用的是调查研究法(42.8%),然后依次为二次分析法(28.0%)、实验研究法(14.9%)、内容分析法(8.3%)和文献计量法(4.8%)。近十年间样本期刊使用的定量研究方法种类更趋多样——文献计量法、话语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得以应用,数据挖掘、学习分析技术的发展也为定量研究带来新的契机。从发展趋势看,近五年二次分析法的应用呈现快速增长,提高了11.4%;而调查研究法下降明显,降低了

16.6%(见表3)。

表3 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及其发展趋势

研究方法	论文篇数(占比)		变化情况
	2013—2017年	2018—2022年	
调查研究	38 (52.1%)	33 (35.5%)	-16.6%
内容分析	4 (5.5%)	10 (9.7%)	4.2%
实验研究	9 (12.3%)	15 (16.1%)	3.8%
文献计量	5 (6.8%)	3 (3.2%)	-3.6%
话语分析	1 (1.4%)	0 (0.0%)	-1.4%
二次分析	16 (21.9%)	31 (33.3%)	11.4%
聚类分析	0 (0.0%)	2 (2.2%)	2.2%

3. 质性研究中研究方法类型得到极大拓展

样本期刊中最常运用的质性研究方法依次为个案研究法(39.5%)、文本分析法(25.0%)、扎根理论(14.5%)和行动研究法(10.4%)。近十年,研究者采用的质性研究方法类型更加丰富。姚计海等的统计结果显示,2001—2011年期间我国5种教育学核心期刊论文所采用的质性研究方法仅为3种——个案研究法、叙事研究法和行动研究法,其他质性研究方法未见分布^[14]。而本研究发现,近十年间样本期刊中质性研究方法拓展至8种。从发展趋势来看,近五年扎根理论、文本分析法得到更广泛应用,而个案研究法、行动研究法占比有所下降(见表4)。

表4 质性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及其发展趋势

研究方法	论文篇数(占比)		变化情况
	2013—2017年	2018—2022年	
个案研究	12 (48.0%)	7 (30.4%)	-17.6%
行动研究	4 (16.0%)	1 (4.3%)	-11.7%
叙事研究	0 (0.0%)	1 (4.3%)	4.3%
田野调查	1 (4.0%)	1 (4.3%)	0.3%
话语分析	0 (0.0%)	1 (4.3%)	4.3%
扎根理论	2 (8.0%)	5 (21.7%)	13.7%
文本分析	5 (20.0%)	7 (30.4%)	10.4%
现象学研究	1 (4.0%)	0 (0.0%)	-4.0%

4. 混合研究中完全混合研究的运用显著提升

混合研究是在同一研究中综合搭配或融合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技术、方法、手段、概念的研究类型^[26]。混合既可能发生在研究的某一阶段,也可能跨越多个阶段。Johnson等根据方法论的侧重将其分为三类:以定量为主导的混合研究、以质性为主导的混合研究和完全混合研究^[27]。统计表明,近十年间样本期刊论文中完全混合研究(51.7%)占比最多,其次为以定量为主导的混合研究(31.7%),以质性为主导的混合研究占比最少(16.6%)。经卡方检验,两组不同时期的混合研究方

法分布存在边缘显著差异($\chi^2=5.804$, $p=0.055<0.1$),近五年完全混合研究的应用显著增长,以定量为主导的混合研究则明显下降(见表5)。

表5 混合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及其发展趋势

研究方法	论文篇数(占比)		变化情况
	2013—2017年	2018—2022年	
以质性为主导的混合研究	5 (19.2%)	5 (14.7%)	-4.5%
以定量为主导的混合研究	12 (46.2%)	7 (20.6%)	-25.6%
完全混合研究	9 (34.6%)	22 (64.7%)	30.1%

(三)发展动因:研究力量年轻化、跨学科化,研究阵地专业化,研究领域交叉化

1. 研究主体:中青年学者、跨学科研究者日渐成为推动范式转型的主力军

2013—2022年间,样本期刊文献主要出自“60后”、“70后”和“80后”学者,他们是我国教育研究的中坚力量。从发文趋势来看,近五年“90后”学者发文量明显上升,较前五年提高了6.0%。如图2所示,“70后”与“80后”学者是教育实证研究的核心作者群体,其实证研究占比分别为31.8%和32.2%。“90后”学者虽因发文总量的限制而占比较小(7.7%),但就发展趋势来看,近五年“90后”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占比大幅提升,增加了11%。考虑到“90后”学者在文章发表时大多仍为硕、博研究生和高校青年教师,尚处于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随着该群体学术积累的增加,他们将与70后、80后学者一道成为推动我国教育研究范式转型的关键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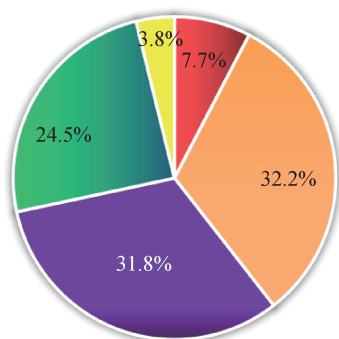


图2 实证研究载文作者的出生年代结构占比

考察作者的学科背景可知,相当比例的非教育学背景学者参与教育知识生产。样本期刊中,151位学者(17.6%)拥有非教育学背景,他们主要来自管理学、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跨科学者近五年发文量与前五年基本持平,但该群体在实证研究中的占比有所提升,由16.8%增至25.3%,表明跨学科背景研究者持续参与教育知识生产,在推进范式转型

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2. 研究阵地:师范院校成为驱动范式变革的重要引擎

近十年间,师范院校仍为教育研究重镇。直属师范院校(270篇,31.4%)、地方师范院校(251篇,29.2%)和地方综合院校(170篇,19.8%)对教育知识生产的贡献率最高。统计表明,研究阵地随时间推移而呈现相对集中的发展态势,近五年间直属师范院校、九校联盟和教育行政机构发文量有所增长,分别提高了4.8%、3.7%和0.9%,其他机构则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直属师范院校的学术影响力与话语权进一步增强。

由图3可知,样本期刊中直属师范院校、地方师范院校与地方综合院校是教育实证研究的主阵地,这三类机构的实证研究占比分别为37.8%、25.9%和22.1%。对比两组时期的实证研究论文数量可知,近五年间九校联盟在实证研究中的占比大幅提升,增长了7.3%;地方综合院校的实证研究数量则明显下降,降低了6.0%;直属师范院校、地方师范院校在实证研究论文中的占比一直领先于其他机构,但近五年发展趋缓。整体而言,近十年间师范院校主导教育学实证研究的进程。以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为首的多所师范院校依托学术期刊打造实证研究阵地,举办实证研究论坛和系列讲座,发挥引领辐射作用,为研究者搭建了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已成为驱动我国教育研究范式变革的重要引擎。在师范院校的带动下,其他研究机构已显现出一定的实证研究倾向,师范院校对其他机构的正向溢出效应日趋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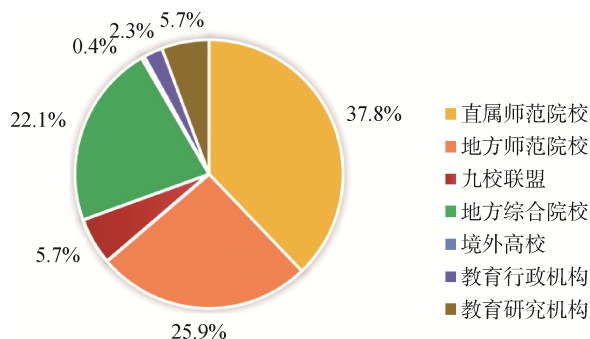


图3 实证研究载文机构的类型占比

3. 研究领域:教育学交叉学科领域在范式更迭中发挥先导作用

近十年间,教育学交叉学科继续深化发展,带动教育研究范式变革。通过考察实证研究成果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分布状况可知,样本期刊刊载教育学专门学科论文502篇,交叉学科论文357篇。交叉学科在发文量上虽远不及专门学科,但其实证研究占比却领先于专门学科(见表6)。可见,交叉学科是推进教育研究范式转型的关键。交叉学科的出现源于对学科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复杂问题解释与解答的需要。交叉学科的这一属性要求研究者采用更为宽广的研究视角、多样的研究方

法与分析工具,进一步带动了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引进与移植。如教育统计学借鉴统计学的聚类分析法,教育人类学引入了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教育经济学运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法,教育社会学引进社会学的网络分析法。这一过程中,教育学不断拓展研究视角,吸纳较为成熟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了教育研究范式的更迭。

表6 实证研究在不同研究领域中的数量占比

学科领域	2013—2017年		2018—2022年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专门学科	51	40.5%	63	42.0%
交叉学科	75	59.5%	87	58.0%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主要结论

1. 教育研究范式的多元格局得以拓展,混合研究成第三大研究范式

2013—2022年间,样本文献呈现出以思辨研究为主导、量化研究次之、质性研究和混合研究各占有一席之地的范式格局。从发展趋势上看,思辨研究在波动中逐渐下降、质性研究发展缓慢、定量研究持续增长、混合研究方兴未艾。近十年间思辨研究仍为主导,但其绝对优势地位不再。实证研究取得较快发展,其中又以混合研究发展最为迅速,跃升为教育学第三大研究范式。

思辨研究数量的逐步下降与实证研究的与日俱增勾勒出我国教育学主流研究范式的演进趋向。这一发展趋势不仅受到西方教育研究范式、我国文化传统、教育政策、科技进步等外部力量的驱动,而且也符合社会科学范式演进的一般规律——由一元走向多元。教育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发展与教育学的学科属性不无关联,社会现象的产生与发展极其复杂,对于现象的解释可以从多个视角出发,采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换言之,每一种范式都可以揭示社会现象的一些维度,而难以展现所有维度。因此,每一种范式都能够为研究者提供不同的理解,带来不同类型的理论,激发不同类型的研究。诚如艾尔·巴比所言“社会科学范式并无取代之说,只有受欢迎程度的变化。”^[28]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规定着范式演进的多元化趋向。

2. 研究方法运用更加多样,研究者建构本土理论的方法论自觉意识有所增强

近十年间,样本期刊文献运用的研究方法多达20余种。在各类研究方法中,近五年占比增长较大的是扎根理论、二次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下降明显的是个案研究法、调查研究法、行动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

扎根理论与文本分析法的与日俱增得益于上述方法自身

的优势。扎根理论强调通过系统的资料收集和分析生成理论,注重理论生成的方法与步骤,弥补了质性研究缺乏规范、信度不高的缺憾。文本分析法以其明晰的分析步骤保证了研究的可信性,非介入的资料获取方式减少了对研究对象的干扰,又因其揭示文本深层意义与隐含信息的优势而倍受研究者青睐。另一方面,这也与当前学界建构本土理论、服务本土实践的诉求不无关系。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研究者逐渐将目光聚焦于我国本土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与教育经验。扎根理论注重从经验数据中建构中层理论,使我们看到数据中的本土特色、实现本土理论创新,有助于摆脱对西方宏大理论的追随与移植。它与经验事实密切联系的特性也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教育实践工作者,为他们提供改进路径^[29]。同时,比较研究法的大幅下降也反映出我国教育研究正在经历从“单向借鉴”到“双向对话”的路向转换,体现了学界对于传播中国声音、增强中国教育国际话语权的方法论自觉。

近五年间,二次分析法的运用较前五年明显增长,而调查研究法的运用有所下降。调查研究法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实际调研,但受制于研究者资金、时间、精力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可能导致所得数据规模小、时间跨度短,其信效度易受质疑;而二次分析法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经科学取样的大规模调查结果,有利于节约成本,提升研究结果的精准度。两者的反差折射出我国教育数据库建设与开放进程的加快。

3. 科学共同体和教育学交叉学科是推动范式转型的关键

从范式的发展动因来看,科学共同体与交叉学科共同推进范式转型。在研究主体方面,中青年学者、跨学科背景学者对推进范式转型发挥积极作用,年轻学者更易采纳新型研究范式,跨学科背景学者不仅为教育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方法和工具,而且也能够合作中发挥自身优势,弥补教育学背景学者在数理统计等方面的不足。他们在与教育学背景学者的合作中,能促进彼此在学科概念、原理、方法等方面的融合,从而突破教育学单维的思维方式,丰富现有的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研究阵地方面,师范类院校主导范式变革方向,对实证研究的发展举足轻重。近年来,多位学者强调“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30],至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已连续举办了九届,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带动了其他机构的实证研究转向,深刻影响着学科重心、评价体系乃至整个学术生态。就研究领域而言,更多实证研究成果出现在教育学交叉学科之中,跨学科研究更加普遍,多领域融通日益频繁,为教育研究范式的多元发展带来了新契机。随着年轻学者学术积累的增加,更多跨学科背景的学者、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对实证研究的关注,实证研究的发展还将进一步提质增速。

(二)研究展望

1. 探索新型科研评价方式,深化实证研究进程

教育评价对范式发展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通过影响研究者的范式选择而作用于范式的发展。量化的科研评价方式具有简便易行、透明度高的特点,但也隐含着引发过度竞争、加剧教育内卷和缺乏学科公平性的隐忧。更重要的是,在科研评价的量化规约下,研究者会倾向于选择耗时短、易产出的研究问题。部分实证研究繁复的资料收集程序、庞大的分析数据与漫长的研究周期往往令研究者望而却步,导致研究内容的窄化和实证研究发展受阻。

推进教育实证研究关键在于变革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引入灵活多元的评价方式。首先,以分类多元评价拓宽教师专业发展渠道,设置教学、科研、管理、人文社科实践等多种类型的晋升通道,引导高校教师根据自身优势和职业发展目标分类竞争、各尽其才;其次,在现有科研评价体系中增加“非学术影响评估”,强调研究成果对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贡献,引导高校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加大对科研成果的利用和转化力度,为社会带来更多积极影响^[31];再次,扩大代表性成果评价的辐射面,突出成果认定的质量导向,纾解教师因评价周期限制而放弃实证研究的问题;最后,适度调整评价周期、探索长周期评价,同时在评价体系中增加实证研究成果的权重,引导更多高校教师自觉投身于实证研究。

2. 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引领实证研究发展方向


大数据研究代表了信息时代的新型知识发现方式,为教育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论和研究手段^[32]。大数据有助于推动定量研究的纵深发展,为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大数据通过收集人们在相对自然状态下行为的大样本、多模态数据,依托云计算进行数据分析,使研究者得以从数据中发现问题、探索规律并进行预测,突破了定量研究能够验证假设却无法进行知识发现的局限;同时,通过链接多个数据源弥补了宏观层次数据的空白,复杂网络分析技术的应用也为研究者发现宏观规律提供了可能,弥补了以往定量研究能够输出微观与中观理论却难以建构宏观理论的缺憾^[33]。

另一方面,大数据通过促进跨学科研究和新兴研究领域的增长而推进实证研究的深入发展。大数据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共通基础,加强了不同学科、不同领域间的对话合作。比如,大数据背景下的教育政策研究促进了教育政策与教育技术研究者的深度合作,依托计算实验仿真平台模拟现实教育系统的演化规律和政策实施效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支持^[34]。又如,循证课例研究建立在实践性知识大数据、课堂教育行为大数据等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基础之上^[34],强化了大学

与中小学的合作、知识生产与社会应用的联系,体现了吉本斯知识生产模式Ⅱ的主体异质性、社会弥散性和组织多样性特征^[35],有效促进了教育研究向应用情境的转换。因此,未来我国教育研究要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推进教育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强化跨学科合作,在对话中增进理解,在合作中实现视域融合,推动实证研究向更高层次迈进。

3. 扎根本土教育境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体系

实现中国教育研究对世界教育学的贡献,必须扎根于中国本土的教育实践,走中国教育学的原创之路^[36]。这就要求我们关注中国的社会情境、中国教育的历史沿革、中国大地的教育问题,探寻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秉承“方法从之于问题”的立场,根据具体问题寻找适切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回应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现实需要。

当前,我国教育领域面临着一系列有待破解的理论问题,真理困境、方法论困境和价值困境制约教育知识生产^[37]。比如,构建层次清晰、多方认同的教育方法论体系是当下亟需关注的教育理论问题。此类问题的解答需要借助思辨研究,发挥思辨研究探寻本原、揭示事物本质的优势。当然,我国教育研究中亦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比如,教育资源分配的区域差异问题、评价体制改革问题、课后服务质量的保障问题,此类问题的破解不能仅凭借理论建构与逻辑推演,更需要在资料收集与分析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之道。摆脱教育领域的现实困境离不开实证研究的深化发展。展望未来,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制约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理论与现实问题,坚持思辨研究对于事理本源的理论探寻,强化实证研究对于证据为本的基本遵循,不断促进教育研究范式的多元化进程,扎实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

作者简介:朱东阳,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理论、教科书研究;王攀峰,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理论、教育研究方法研究,本文通讯作者;孙彬涵,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科书研究。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优先关注课题“教育研究范式创新研究”(BBEA2100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曾天山,滕瀚.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学科在社会科学中的影响力分析——以《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教育学术论文为例[J].教育研究,2013(4):11-21.
- [2] 刘晶波,丰新娜,李娟.1996—2006年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研究方法的运用状况与分析——基于三所高校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J].学前教育研究,2007(9):15-23.

- [3] 高耀明,范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1979—2008——基于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新)“高等教育专题”高被引论文的内容分析[J].大学教育科学,2010(3):18-25.
- [4] 钟秉林,赵应生,洪煜.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基于近三年教育类核心期刊论文量化分析的研究[J].教育研究,2009,30(7):14-21.
- [5] 张慧,查强.我国职业教育研究方法之研究——基于2012~2017年CSSCI期刊文献的计量分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8(3):186-195.
- [6] 胡来林,安玉洁.近十年来我国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反思[J].电化教育研究,2006,27(2):14-17+38.
- [7] 刘丽敏,洪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现状及其反思——基于1994—2015年104篇博士学位论文的统计分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149-155.
- [8] 陆根书,刘萍,陈晨,等.中外教育研究方法比较——基于国内外九种教育研究期刊的实证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6,37(10):55-65.
- [9] 朱军文,马银琦.教育实证研究这五年:特征、趋势及展望[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38(9):16-35.
- [10] 王树涛,顾建民.国际教育科学研究范式的演变与趋势——基于2010—2019年文献计量的分析[J].教育研究,2020,41(9):135-145.
- [11] 韩双淼,谢静.国外教育研究方法的应用特征——基于2000—2019年34本教育学SSCI收录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21,42(1):68-76.
- [12] 严凌燕.国际学者教育研究方法使用的基本特征与启示——基于《美国教育研究期刊》的分析[J].外国教育研究,2020,47(10):23-38.
- [13] 郑日昌,崔丽霞.二十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反思[J].教育研究,2001,22(6):17-21.
- [14] 姚计海,王喜雪.近十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分析与反思[J].教育研究,2013,34(3):20-24+73.
- [15] 黄忠敬,孙晓雪,王倩.从思辨到实证:教育公平研究范式的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38(9):119-136.
- [16] 余胜泉,徐刘杰.大数据时代的教育计算实验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9,40(1):17-24.
- [17] 王卫华.教育思辨研究与教育实证研究:从分野到共生[J].教育研究,2019,40(9):139-148.
- [18] 姚计海.教育实证研究方法的范式问题与反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5(3):64-71+169-170.
- [19] KHALDI K. Quantitative, qualitative or mixed research: which research paradigm to use?[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2017,7(2):15-24.
- [20] CRESWELL J W, CRESWELL J D. Research designs: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14:4-16.
- [21] MORGAN D L. Paradigms lost and pragmatism regained[J].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2007,1(1):48-76.
- [22] JOHNSON R B, ONWUEGBUZIE A J. Mixed methods research: a research paradigm whose time has come[J]. Educational Researcher,2004,33(7):14-26.
- [23]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40-141.
- [24] 张亚光,毕悦.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进与趋向——以高频被引文献中的“睡美人”“昙花一现”现象为例[J].财经研究,2023,49(3):49-63.
- [25] GOODWIN L D, GOODWIN W L. Statistical techniques in "AERJ" articles, 1979-1983: the prepar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to read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literature[J]. Educational Researcher,1985,14(2):5.
- [26] TASHAKKORI A, CRESWELL J W. Editorial: the new era of mixed methods[J].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2007,1(1):3-7.
- [27] JOHNSON R B, ONWUEGBUZIE A J, TURNER L A. Toward a definition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J].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2007,1(2):112-133.
- [28] 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13版)[M].邱泽奇,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52-53.
- [29] 陈向明.扎根理论在中国教育研究中的运用探索[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13(1):2-15+188.
- [30] 袁振国.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5(3):4-17+168.
- [31] 王楠,罗珺文.高校科研成果的非学术影响及其评估: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38(4):62-71.
- [32] 余胜泉,徐刘杰.大数据时代的教育计算实验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9,40(1):17-24.
- [33] 梁玉成,贾小双.大数据拓展社会定量研究方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6-14(1-2).
- [34] 王陆,郑志生,张敏霞,等.大数据赋能循证课例研究中的知识治理[J].电化教育研究,2021,42(12):5-12+20.
- [35] 吉本斯.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陈洪捷,沈文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9.
- [36] 袁德润.从“教育学中国化”到“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视角[J].现代教育论丛,2008(3):2-6+10.
- [37] 李政涛,周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与中国教育学的知识供给[J].教育研究,2022,43(2):83-98.

(责任编辑:薛娇)